

摘要

本論文係針對美國當代女性主義藝術家茱蒂·芝加哥於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所製作的作品《晚宴》，作一批評性之詮釋。筆者最大的貢獻在於對一九八〇年代女性主義的評論家批評《晚宴》為本質論的說法提出翻案。這些評論家認為《晚宴》中以花、蝴蝶及女性器官等等中心意象的綻放及飛翔來突顯性別差異，並象徵女性解放及女性主體的建立之作法，為根基於生物解剖來決定兩性特徵的本質論。筆者以芝加哥的自傳、女性主義理論及實踐史等角度，解構這些理論家的說法。提出《晚宴》中的中心意象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象徵，而非本質論。在第一章中，筆者將研究重心擺在茱蒂·芝加哥在當代藝術史的地位上。在第二章中，筆者追溯茱蒂·芝加哥創作《晚宴》之前藝術發展的軌跡。在第三章中，筆者集中於分析及詮釋《晚宴》作品本身。在第三章第二節中，筆者由茱蒂·芝加哥的經驗為出發點，討論女性藝術家發展工藝技術的重要性。在第三章第三節中，筆者具體而詳盡的分析茱蒂·芝加哥發展中心意象的過程。此一過程與芝加哥作為一個女性藝術家，在男性主宰的藝術世界中掙扎立足的心路歷程息息相關。筆者的結論為：女性主義運動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勃興，使得芝加哥敢於揚棄其原先在男性中心的藝術世界所接受之形式主義訓練，並突顯女性內容於作品中。而表現女性內容的中心意象正象徵女性身體及角色的看法。《晚宴》中的中心意象，正是這個發展的高峰。在第四章中，筆者檢視了《晚宴》的美學基礎，以及其連帶的問題與爭論。在總結中，筆者認為應給予《晚宴》在女性主義藝術史及當代藝術史上，重新定位及肯定。